

沈从文小说创作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

吴正锋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湖南 长沙 410003)

[摘要]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沈从文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都有极为深刻的影响。沈从文在表现都市情欲、乡村性爱、“诗与火”内在个人爱欲体验等性爱题材小说方面,自觉借鉴和运用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从而深化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但同时也给其创作带来某种局限性。

[关键词] 沈从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都市情欲;乡村性爱;个人爱欲体验

[中图分类号] I207.4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2)04-0123-06

Analysis on Shen Congwen's Novel Creation and Freud's Psychoanalytic Theory

WU Zhengfeng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Hunan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ngsha, 410003, China)

Abstract: Freud's psychoanalytic theory had profound effect on Shen Congwen's creative thinking and writing practice. In his erotic fictions, Shen Congwen draw lessons from and use Freud's psychoanalytic theory to perform urban love, rural sex and individual erotic experience just like poetry and fire, which deepened his fiction creation and also brings some limits.

Key words: Shen Congwen; Freud; psychoanalysis theory; urban love; rural sex; individual erotic experience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沈从文创作影响极为深刻。沈从文刚步入文坛便开始接触到弗洛伊德等西方现代心理学并一直对此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贯串着沈从文整个文学创作过程之中。沈从文不仅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解释文学创作,而且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作为理论资源,在其都市情欲、乡村性爱、“诗与火”内在个人爱欲体验等题材小说中对三种性爱形式都作出了十分精彩的描绘。沈从文在借鉴吸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成果的同时,也实现了对理论的超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在给沈从文创作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沈从文创作具有某种局限性。

一 沈从文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接受

沈从文对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心理学十分关注,十分了解。凌宇教授曾经在一篇论文里指出:“沈从文生前在一次与笔者的谈话中,曾颇为自得地说:‘我对病态心理学很有研究。’”^[1]沈从文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刚刚步入文坛时便开始接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他在《答瑞典友人问》中提到自己表弟夏云在燕京大学心理系作助教,通过他而接触到弗洛伊德的学说是1924或1925年。^{[2]344}沈从文早期小说中就出现了“下意识”“潜意识”等术语。例如:沈从文于1925年9月5日发表《晨报·文学旬刊》第80号上的《用A字

收稿日期:2012-04-13

作者简介:吴正锋(1970-),男,湖南保靖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记录下来的事》就出现“下意识”的术语。^[3]沈从文对心理学,特别是变态心理学始终如一地爱好。1930年6月,沈从文写信给妻子张兆和,信中写道:“‘爱’解作一种病的名称,是一个法国心理学者的发明。”^{[4]94}1937年11月6日,沈从文在武昌给张兆和回信道:“我近来因为读了些书,读了些关于生理学和人生哲学的书籍。”^{[5]263}1938年7月30日沈从文写给沦陷在北平的妻子张兆和的信中提到:“近来看一本《变态心理学》。”^{[5]318}沈从文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佛洛伊德谈心理分析,把人类活动的基因,都归纳到一个‘性’字上去。以为一切愿望与动力都和‘性’相会通,相连结。”^{[6]259~260}1949年沈从文精神面临重大的危机并一度导致失常,张兆和认为这与“他平常喜读《变态心理学》。”^[7]有关,而沈从文事后总结道:“我企图由一个在‘病理学或变态心理学可作标本参考’目的下,写下这点东西。”^{[2]3}1951年,沈从文对自己所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作出明确的表述,他认为《七色魔》的写作“显然有佛洛伊德、乔依司等等作品支离破碎的反映。”^{[8]367}金介甫所著《凤凰之子·沈从文传》对沈从文接受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也作了很好的论述。以上可以看出,沈从文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是持久关注与深入了解的。

二 沈从文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解释文艺创作

沈从文对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心理学解释文艺创作动力。沈从文在《烛虚》中写道:“永生意义,或为生命分裂而成子嗣延续,或凭不同材料产生文学艺术。”^{[8]24}沈从文认为创作的动力“可说是从性本能分出,加上一种想象的贪心而成的。”^{[8]71}沈从文把文艺创作看作是一种性本能的升华、求得生命的永生的一种手段。沈从文在《水云》中以弗洛伊德学说为依据来解释自己的创作情况。沈从文认为《八骏图》的创作用意“只是在组织一个梦境,至于用来表现‘人’在各种限制下所见出的性心理错综情感”,^{[8]101}而《月下小景》佛经改编故事的创作,“用碛砂藏中诸经作根据,来把佛经中小故事放大翻新,注入我生命中属于压抑的种种纤

细感觉和荒唐想象”。^{[8]104}《边城》的创作乃是因为:“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完全排泄与弥补。”^{[8]111}《看虹录》则“看出自然所给予一个年青肉体完美处和精细处”,“我理会的只是一种生命形式,以及一种自然道德的形式,没有冲突,超越得失,我从一个人的肉体上认识了神。”^{[8]117}

三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与都市情欲表现

沈从文都市题材小说贯串着一条红线,即描写现代都市人生与自然人性相背离,都市的情欲被社会道德和各种名分压抑和束缚而扭曲变态,需要疗治。他说:“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8]14}沈从文在《八骏图》里选取被称为“千里马”的8位大学教授,他们表面上庄重老成,但在下意识中却时时流露出爱欲的冲动,形成人格分离的病态人生。沈从文“自命为医治人类魂灵的医生”^{[9]225}和“人性的治疗者。”^[10]他洞幽烛微,深入到人物灵魂隐蔽的一角,烛照现代都市人生的“性心理错综情感”。《有学问的人》中天福先生与女客人只是“嗅嗅酒”便止步了,沈从文对他们身上所承载的社会社会道德文明礼教导致其人性的萎弱表示嘲讽。沈从文还在《薄寒》《一个女剧员的生活》《都市一妇人》《如蕤》等小说对现代都市“阉寺”性提出尖锐的批判,认为现代都市恋爱缺乏光,缺乏热,千篇一律,缺乏健全生命力。“民族衰老了,为本能推动而形成的野蛮事,也不会再发生了……恋爱则只是一群阉鸡似的男子,各处扮演着丑角喜剧”。此外,沈从文还在大量的自叙传性小说里描述遭受性压抑的病态人生。

如何治疗“性心理错综情感”?沈从文认为应该顺应人的自然要求,让压抑过甚的“里比多”的能量得到正常释放,从而恢复人性健康。对此,《八骏图》中达士决心冒险“用海”来尝试治疗自己“很蹊跷的病”,用本能战胜理智。《第四》小说中那位爱情上受过伤的朋友通过一番深入的交谈,他的病居然奇迹般地好了,与一个女医生订了婚,这与弗洛伊德通过交谈治疗精神疾病的方式相似。弗洛伊德认为精神病的成因大多与压抑有关,和道德习俗

不相容的欲望被道德意志驱逐到意识之外,在潜意识中成为情结,解放被淤积的不得其所的“里比多”的潜力,使它循正当图径发泄,从而将病治愈。正如沈从文在《给某教授》里指出的那样,结婚是治疗因为性压抑而产生疾病的良方。

但是,沈从文对都市男女放纵情欲也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并对此进行严厉的批评。沈从文描写绅士们为了满足个人情欲,进行伤风败俗、丑陋卑劣的表演。沈从文在《绅士的太太》以他精妙细致的笔触,将绅士们的情欲泛滥道德沦丧穷形尽相地表现出来。《平凡的故事》《宋代表》《蜜柑》等作品写大学生中间进行着的庸俗虚假的爱情游戏,小说对这种空虚无聊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进行了讽刺。

现代都市人生既不能受现代文明压抑而导致性爱畸变、生命力萎弱,又不能放纵情欲、沦为行尸走肉,成为沈从文对都市情欲思考的两极。

四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与乡村性爱书写

沈从文乡村题材小说主要表现的是建立在两情相悦、“超越一切利害”关系上的属人本质的合乎自然的性爱方式。正如《龙朱》里所说:“抓出自己的心,放在爱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11]327}《旅店》中旅店年青寡妇老板娘黑猫,在平静中生活了3年,但在一个充满星光美丽的清晨,“一种突起的不端方的欲望”使黑猫一反常态地与一个大鼻子客人在旅店外野合。自然欲求不仅生出“对平时矜持的反抗”,而且突破宗教教义,突破人间仇杀而显示其人性之光。譬如《道士与道场》人性战胜了佛性,《渔》爱情战胜家族仇恨。沈从文在《龙朱》《神巫之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中表现了原始自然人性所具有的热烈、大胆、自由的爱。龙朱通过对歌大胆追求黄牛寨寨主的女人,神巫“愿意做人的仆不愿再做神的仆了”,豹子与媚金一诺千金证明爱的坚贞,傩佑与他的情人将爱情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沈从文在《阿黑小史》《采蕨·阿黑小史第五》《雨后》等作品表现前封建时代乡村自然性爱,这是一种充满生机与自由,纯乎天真而又恣肆无忌的两性关系形态,这种

关系不受任何专门男女间设置的社会规矩与观念的束缚,一切循乎自然。《雨后》中四狗“幸好不认字,不然这一对,当更不知道在这样天气下找应当找的乐了。”《阿黑小史》与《采蕨·阿黑小史第五》极力宣染阿黑与五明婚前的调情与戏谑,就是在做父亲的眼皮底下进行,也不会遭到禁忌与处罚,“人既在一块长大,懂了事,互相欢喜中意,非变成一个不行,做父亲的似乎也无反对理由”,因为“使人顽固的是礼教与空虚的教育,这两者却不曾在阿黑的爹脑中有影响”。沈从文甚至将水手与妓女之间的关系,也作了理想化的抒写。“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9]70~71}《柏子》反映的便是这样的情况。《边城》更是对湘西性爱中所具有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了生动的书写。小说中出现的两组对立:马路——车路,渡船——碾坊,表现的是自然性爱欲求与外在财富的对立。走马路,唱歌求爱,代表的是自然健康的性爱形式;走车路,请媒提亲,代表的是财富对爱情的侵入。傩送拒绝了代表财富的碾坊的诱惑,选择了只有光人的渡船。傩送翠翠坚守的是爱的属人本质。需要指出的是,沈从文通过对湘西小儿女优美健康自然性爱的抒写,构筑起湘西乌托邦想象的最重要的价值载体和理想的人生形式。

沈从文在书写湘西人美好性爱关系的同时,也感受到其存在的危机。如果说《龙朱》《神巫之爱》中的爱恋是自由的,那么在《媚金·豹子·与那羊》已经开始显现家族仇杀的阴影,而《月下小景》更是表明残忍的风俗对自由性爱的破坏,人类史前时代的自由性爱已开始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威胁。沈从文认为湘西苗族老年妇人作蛊,中年女人成巫,以及少女落洞致死现象,“三者同源而异流,都源于人神错综,一种情绪被压抑后变态的发展。”^{[4]395}小说《阿黑小史》中五明、《山鬼》中癡子都因恋爱不成转成疯癫,《医生》《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描写青年男子尸恋,《巧秀和冬生》中族祖因性压抑而导致的虐待行为,这些小说都写到湘西人性压抑而

导致的心理变态和失常。沈从文还写了湘西人在现代社会中性爱关系上的畸变。如《萧萧》中萧萧12岁嫁给3岁的小丈夫,《丈夫》中丈夫将妻子送到城里河船上“做生意”,《贵生》中贵生的美好姻缘被当地乡绅五爷夺走,这些都是近现代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导致的人性扭曲,与湘西原始文化所代表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形成鲜明对比。随着湘西社会的日益现代化,沈从文感觉到湘西原始美好文化面临生存危机。

五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与“诗与火”内在个人爱欲体验

沈从文曾经自称为“恋爱作家”,并由此在《复许杰》中将自己的小说大致分为三类,^{[20]378}即乡村抒情小说,都市讽刺小说和“纯粹当成‘艺术品’抒情诗而作的”小说,我将最后一种小说称为“诗与火”内在个人爱欲小说。沈从文这类作品熔铸了作者自己的人生爱欲经验,即沈从文所说“写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12]378}也即他所说的“即纯粹当成‘艺术品’抒情诗而作的”,主要作品有《看虹录》、《摘星录·绿的梦》、《梦与现实》(《梦与现实》桂林本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0卷为《摘星录》,这里以最早刊发的香港本《梦与现实》为标题,《摘星录·绿的梦》为沈从文佚文,原于1941年6月20日、7月5日与7月20日分三次载于香港《大风》第92-94期,作者署名李綦周,后长期失传,后经裴春芳先生发掘考证,刊发于《十月》2009年第2期,此文才重见天日。这些作品带有幻异的唯美特征,在错综迷离的艺术境地叙述一种美妙的爱欲奇遇,“都近于自传中一部分内部生命的活动形式”,^{[6]471-472}“作者与书中角色,二而一,或在想象的继续中,或在事件的继续中,由极端纷乱终于得到完全平静。”^{[13]344}

沈从文在这些小说中生动地展示了生命本能的压抑——放纵——压抑这一过程,特别是将爱欲的放纵作为重点,作出了十分美妙精细的描绘,我将之称为内在生命的“燃烧”。沈从文在《〈看虹摘星录〉后记》里写道:“另外合乎理想的读者,当

是一位医生,一个性心理分析专家,或一个教授,如陈雪屏先生,因为也许可以作为他要‘知道’或‘得到’的一部分‘情感发炎’的过程纪录”。他在《摘星录·绿的梦》这篇小说的后记里也作了近似的表述。沈从文谈到生命力因受到“无形无质的社会压抑”下,这种生命力在某种情形下“转入梦境,找寻排泄”,“一个作者若能客观而谨慎的用一支笔来表现,自然可望产生若干优秀艺术品。”^{[13]344}《摘星录·绿的梦》描写的是男客人与女主人发生在内室的一次情欲体验,小说以精细的写实之笔,“严峻而诚实来处理它”,^[14]尽管小说文词华美,并尽可能含蓄,但其基本事实还是显得大胆而刻露。小说将男女性爱之中纤细微妙的情感、完整的情欲过程从起始到结束作了完整而精细的描述,人类性爱本身过程的美丽和精致成为这篇小说描写中心。《看虹录》同样描写的是男客人与女主人发生在客厅的一次情欲体验,相比于《摘星录·绿的梦》文笔的直露,《看虹录》更多典喻化、象征化,化“实”为“虚”,变“真”成“梦”,笔致就较为隐晦,典喻色彩更浓,叙述方式也更曲折。《梦与现实》(也就是《沈从文全集》中的《摘星录》,但与香港最早的刊发本文字有所不同)则描写大龄未婚多情善怀的女青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艰难选择与情感徘徊,“个人生活正在这种古典风格与现代实际两种矛盾中,灵魂需要与生活需要互相冲突。”^[15]小说特别是通过一个诗人的书信,讲述这个青年女子给予诗人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灵魂在狂热中的愉悦,这可以与《摘星录·绿的梦》《看虹录》形成互文,在赞美女性肉体之美方面,三篇小说具有内在契合点,但《梦与现实》增加了对女性用情不专的责难。沈从文在新旧历史巨变的时期对自己的这部分创作进行检讨,他说:“《七色魔》等极端病态的、邪僻的、不健康的格式。而这促成这个发展的,显然有佛洛依德、乔依司等等作品支离破碎的反映。”^{[8]367}

《看虹录》《摘星录·绿的梦》《梦与现实》是沈从文企图超越世俗所要求的伦理道德价值而“用人心人事作曲”,以“一己见人类”的大胆尝试,对人类的“情感发炎”过程进行了完整而精细的纪录,对生命内在的“诗与火”进行唯美抒写,而女性美的身

体成为生命唯美象征的重要载体。他说:“一个年青读者还希望从我这些仿佛艳而不庄作品中,对于某种女人产生一个崇高优美的印象。”^{[13]347} 沈从文以科学客观的态度正视爱欲过程中性心理的真实与美丽。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沈从文创作影响至为深刻。但是,沈从文也不是完全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全盘吸收,他在一些方面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超越。这在沈从文后期的散文和杂文中有大量的表现,而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沈从文将人生分作“生活”与“生命”;并且认为:人之为人,应当超越单纯的“生活”,而追求属于人生高尚理想与情操的精神生活,这才是区别于动物的人的“生命”。这便突破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性欲决定论及其动物化的人性模型,而与马斯洛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取向一致。马斯洛认为,人类除了满足其低层次的或动物式的生理需要之外,还有自我实现的需要。按照马斯洛的观点,人的基本需要是逐级向上发展的,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就会产生高层次的需要,而层次越高的需要,越能体现人性特征。马斯洛说:“精神生命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从而,它是确定人的本性的特征,没有这一部分,人的本性就不完善。”^{[16]223}

六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沈从文创作影响的得失

以上探讨了沈从文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吸收和超越。那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沈从文创作影响有何得失呢?也就是说,沈从文借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得到了什么?又在哪些方面使其创作受到束缚和局限?

我认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沈从文创作影响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为沈从文观察社会人生,构建其人性系统提供了重要理论武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为沈从文提供了一个书写人性展示人物心灵世界的有力工具。沈从文是中国现代卓越的性心理描绘家,是一个隐蔽的心理学

家,人类灵魂的透视者和人性的治疗者。

其次,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使沈从文在小说人物心理特别是人物潜意识和性心理的描绘上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沈从文乡村抒情想象题材小说多注意描写具有潜意识表征的细节,特别是注重具有性征象的事物和性意向的梦幻描绘。都市现实讽刺题材人物的描写,多注重两重人格的描写,描写人物分离而矛盾的里与外、言与行。而个人内在生命“诗与火”燃烧的描写,作者仿如“一个性心理分析专科医生”,唯美而精细地将性爱过程完美地展示出来了。

再次,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是构成沈从文创作独特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现代文学由于外部形势的险恶,文学创作往往与现实紧密联系,成为现实社会斗争的一种工具。沈从文却始终坚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作为他创作的一种重要理论资源,这就使得他的创作在整个现代文学中颇显独立。在文学普遍成为“向社会即日兑现”的工具后,沈从文却通过借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探讨健康合理的人性,重造现代民族品格及现代民族文化,“为这个民族理智与德性而来有所写作”,显示出沈从文“所走的路又是一条怎样孤僻的小路”。^[17]

在看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给沈从文创作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这种理论也给他的创作带来某种局限性。

首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使沈从文创作与激烈的社会现实斗争具有一定的距离。由此沈从文被左翼评论家批评为“一个空虚的作者”,“而最有力地诱引着读者于低级的趣味的作者”,^[18]“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是毫无疑问的”,^[19]这些批评虽然表现得极为偏颇,但是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沈从文创作与现实斗争联系得不是很紧密。

其次,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使沈从文创作选取的视角相对狭小而单一。沈从文创作了大量各种题材的小说,但大多描写男女两性性爱关系,“他喜用爱欲的题材”,“把爱欲看为人性的冲动的最高的形象而表现着了”,^[20]沈从文自称“事实上我倒应当承爱‘恋爱作家’的称呼”,^{[12]378}这些都表明沈

从文创作题材选取视角的相对狭小而单一。不仅如此,沈从文在表现两性关系时很少看到人物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而是将人的自然属性和本能需求放在比较突出的位置,这构成了一些批评家抨击沈从文的一个理由。这与沈从文注目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借鉴,而对人的精神性的描写相对缺失有一定的关系。

再次,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使沈从文创作人物性格比较平面“扁形”,且缺少发展变化。英国著名小说理论家爱·摩·福斯特在他的《小说面面观》里提出著名的关于“扁形”人物与“浑圆”人物的区分。“扁形”人物指仅具备一种气质的,属于“平面性”的人物;“浑圆”人物则指具备多方面的复杂性格的,给人“立体感”的人物。如果按扁形人物和浑圆人物来划分,那么,沈从文的小说人物大多是扁形人物。例如道貌岸然的绅士阶级,天真纯粹的湘西小儿女,正直素朴的老湘西儿子,等等。由于过多地依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来描写人物,相对而言,从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出发来表现人物就显得不够,这样就限制了人物性格多方面表现,特别是不能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这是形成沈从文创作人物平面“扁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 [1] 凌宇. 沈从文的生命观与西方现代心理学[J]. 南京大学报:哲社科版,2002(2):30-36.
- [2]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27卷[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 [3]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1卷[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77.
- [4]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11卷[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 [5]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18卷[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 [6]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14卷[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 [7] 张兆和. 沈从文全集:19卷[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2.
- [8]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12卷[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 [9]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8卷[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 [10]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17卷[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95.
- [11]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5卷[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27.
- [12]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24卷[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 [13]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16卷[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 [14] 李慕周(沈从文笔名). 摘星录·绿的梦[J]. 十月,2009(2):20-29.
- [15]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10卷[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63.
- [16] 马斯洛. 人的潜能和价值[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23.
- [17]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7卷[M]. 山西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79-80.
- [18] 侍桁. 一个空虚的作者[M]//王 珞. 沈从文评说八十年.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167.
- [19] 郭沫若. 斥反动文艺[M]//王 珞. 沈从文评说八十年.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265.
- [20] 侍桁. 故事的复制[M]//王 珞. 沈从文评说八十年.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181.

责任编辑:黄声波